



Chinese Cases
in Applying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 中国案例

冯 冰◎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 中国案例

冯 冰◎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中国案例 / 冯冰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4

ISBN 978-7-308-19532-4

I. ①布… II. ①冯… III. ①布迪厄—社会学—理论
研究 IV. ①C91-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99574 号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中国案例

冯 冰 著

责任编辑 牟琳琳

责任校对 刘葭子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4 千

版 次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532-4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2BSH001

自序

一直以来,我被社会学这门学科所具有的特殊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激励和鼓舞着。作为敏锐的社会旁观者、社会行动者和社会研究者,社会学总是能在变化中的社会里及时发现并捕捉到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它的使命在于找到引发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根源,解释人与社会之间的多元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群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等。然而,社会学的终极使命不仅仅是要找到造成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用科学的逻辑解释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防患于未然的途径。

19年前,我初次接触布迪厄(Pierre Bourdieu)^①的理论,是通过阅读我导师保罗·克诺利(Paul Connolly)教授的第一本专著 *Racism, Gender Identities and Young Children*^②。而不断激励我从事布迪厄“实践理论”研究的动力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布迪厄是一位深入扎根于社会生活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观察、发现问题和解释问题的学者。此后,我便从未停止对布迪厄理论的关注、研究和反思。他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调研得出的逻辑性解释上升为具有一定普遍性规律的理论。他把这个研究过程看作是社会学家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门便于实践的“技艺”。我热爱这门“技艺”,尤其热爱发现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最终服务于社会的研究过程。19年来,我的这种热情有增无减,并不断把这份热情传递给我的每一届学生:努力培养他们对社会的敏感度和责任感,鼓励他们追求社会公平,为弱势群体发声,并以研究者的身份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我也鼓励学生多读善思,敢于反思和批评,并能结合我国的文化特点来补充和发展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

① Pierre Bourdieu,法国社会学家。本书正文译名统一为布迪厄。参考文献有作布尔迪约、布尔迪厄。

② CONNOLLY P. *Racism, Gender Identities and Young Children: Social Relations in a Multi-Ethnic, Inner-City Primary School* [M]. London: Routledge, 1998b.

众所周知,忽视社会或文化差异,生搬硬套地运用某个社会学理论,有陷入僵化的风险。社会学理论的应用绝不能脱离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更不能僵化为无视社会制度和地域文化、无视社会变迁的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他观察和研究法国社会生活的结果,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否对其他社会文化现象同样具有普适性?在应用时是否会有文化差异?如果有,会有什么样的差异?这些问题都有待检验,这也是我着手本课题的出发点。我想把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拿到中国社会进行检验,找出并解释差异和问题,同时试图对该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进行基于本土实践的跨文化的补充。

本书正是检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应用于我国本土是否具有普适性的跨文化/跨社会的地方性尝试。研究对象包括海归、高校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和小微企业家四个群体(他们在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上均有差异)。研究对象的来源地包括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研究目的是想看看这几个群体的现状或生存方式是否印证了布迪厄的“场域、习性、资本”(field, habitus, capitals)概念:特定的“场域”(相对独立并具有层级权利关系的开放性空间)培养了“场域”内行动者的特定“习性”(习惯性思维和言行方式)和“资本”(后天获得和积累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布氏理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似较明显,而在小微企业家群体中则并不显著。如果调研检验的结果证明了布迪厄的实践逻辑,那么则一定程度地印证了此理论在我国本土的普适性。如果验证结果与其相悖,则有必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点对此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根据布迪厄“实践理论”中“场域、习性、资本”的核心概念,我对浙江省四个不同阶层的外来群体分别做了概念批判性的检验和应用。通过对本研究数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检验布迪厄的三个核心概念是否具有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普适性。

我在对四个不同阶层的外来群体的观察和调研^①中,发现有不少与布迪厄所述概念弱相关甚至相悖的情况。特别是对布迪厄提出的三个概念(场域、习性、资本)的阶级性和可持续性,我提出了质疑。针对布迪厄所强调的源于个体历史的“习性”决定现状的暗示,我提出了“理性动机决定现状”的补充,即个体为了应对现实危机,是能够冲破以往经验的束缚并激发出其主观能动性的。提出这个补充,是因为意识到人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当他回看自己所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以及

^① 对海归、新生代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小微企业家四个群体的访谈分别发生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

做过的决定时,那些回看的内容便成为个人历史。历史其实是由每个人过去经历过的许多不同事件组成,它本身并不具有可持久的固化性。布迪厄把“习性”看作个人历史积累的产物,似乎过于强调人们对过去难以摆脱的被动性,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本研究提出的“理性动机决定现状”这一补充性概念,在部分章节中得到了定性和定量数据分析上的验证和支持,对部分研究对象的行为也具有解释力。

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本研究显示:(1)布迪厄所述的相对稳定的“场域”概念在我国应用时有一定的偏差。比如,我国不同“场域”之间的流动性较大,具体体现在外来人口在城市、行业、企业间的频繁流动,人们总是不断寻求更好的机会和待遇。因此,各个“场域”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2)按照布迪厄的具有阶级性的“习性”概念,农民的孩子成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孩子成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会更大,此乃“习性”所致。然而本研究的数据却显示,不少来自条件较差的农民家庭的成功小微企业家与来自都市的高校毕业生相比,在“习性”上并无太大差异(见第五章)。(3)布迪厄所说的“资本”概念(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提示,一个人资本累积得越高,其社会地位也相对越高。而本研究的数据则显示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往往并非同步,比如有些经济资本较高的群体(企业家)并不同时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较高的群体(专家、学者)也不一定同时拥有如企业家群体那样高的经济资本。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内部也会出现因缺乏目标和动机、贪图安逸而业绩平平的个体(参见第四章);而文化资本较低的群体则可以通过大量社会实践积累社会资本,社会实践可以使得他们善于察言观色并提升他们对人和事的分辨能力,这些都可以沉淀为该群体特有的社会资本。

对于“场域”和“习性”之间的关系,我也另有解读。布迪厄把个体“习性”看作是起源于某种“场域”的个体历史的产物。然而,我国的具体实例证明,由于“场域”边界不清、规则多变,导致个体“习性”随着“场域”的变化、自身经验的生长而逐渐发生改变。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那样,许多人的父辈出身农民,受过的教育很有限,但随着时代的变动、个人经历的不断积累、个人与世界的互动,加上职业培训和再教育,他们的“习性”不再是简单的农民习性,而是逐渐发生着变化,有的堪称质变。人的一生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包含太多的自我调节、转折和变化。因此,我更倾向于把个体一生中不断变换“场域”的过程看作是理性选择和调整的过程;把“习性”看作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特别是受动机的驱使而不断调整思维和行为的结果,而绝不是简单的阶级化“习性”。因为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动机和目标的驱使,动机从萌发到确定再到强化,是一个来源于累积的

“习性”、随着变化的“场域”、在与世界的不断交流中逐渐形成和渐进发展的过程。

正如华康德在一次受访中所言：社会科学不是宗教，布迪厄的追随者也不是信徒，而是批判性、反思性的社会科学规划中的合作者和协作者。“布迪厄一心一意地反对那种为知识正统开路而将思想教条化的做法。反思社会学力图促使更多的人拿起反抗符号支配(Symbolic domination)的武器。”^①既然批判性反思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学者的使命，那么作为布迪厄的追随者之一，我也是批判性社会科学规划中的众多协作者之一，理应去反思、质疑和深入探讨大师的核心概念。本研究在经过反思性验证，发现“场域、习性、资本”等核心概念在我国应用时出现了一些反例。我根据这些反例对布迪厄的核心概念提出了四个补充性建议：(1)资本的不同带给人们的差异是可以逆向的，即越缺少则越渴望、越努力；(2)“理性动机”本身也是一种“习性”；(3)个体的社会阶层并不决定其后代的未来社会阶层归属，变数之一是“理性动机”；(4)“理性动机”的具体目标和对目标的渴望程度是目标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本研究根据数据分析所出的最终结论是：无论哪一个阶层，人们的行为与出身弱相关，与理性动机强相关。

冯 冰

2019年5月5日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①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1.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布迪厄“实践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 1

- 一、问题的提出 / 1
- 二、布迪厄“实践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偏差 / 2
- 三、对“场域”“习性”“资本”概念的质疑 / 7
- 四、本章结语 / 18

第二章 检验布迪厄“实践理论”之一

——海归的适应性策略 / 19

- 一、研究背景 / 19
- 二、问题的提出 / 20
- 三、研究理论和方法 / 21
- 四、案例分析 / 25
- 五、本章结语 / 40

第三章 检验布迪厄“实践理论”之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 / 42

- 一、问题的提出 / 42
- 二、职业规划的测量 / 43
- 三、影响职业规划的其他因素 / 47
- 四、质性访谈 / 51
- 五、深度发现 / 66
- 六、本章结语 / 68

第四章 检验布迪厄“实践理论”之三

——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过程 / 71

一、布迪厄“资本”的概念 / 72

二、“文化资本”与高校毕业生留城求职优势的相关性 / 74

三、“社会资本”与高校毕业生留城求职过程的相关性 / 75

四、“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关性 / 79

五、本章结语 / 84

第五章 检验布迪厄“实践理论”之四

——小微企业家的创业动机 / 86

一、重申本章的研究问题 / 87

二、“习性”还是“理性”？——定量研究中的规律性 / 91

三、“习性”还是“理性”？——定性研究中的案例分析 / 94

四、“理性动机”是否决定创业成就？ / 105

五、本章结语 / 108

第六章 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对研究过程的反思 / 110

一、研究地域的局限性 / 111

二、对阶层性“群体”界定的反思 / 111

参考文献 / 113

附录 / 121

附录一：访谈完整记录(第二章) / 121

附录二：访谈完整记录(第三章) / 129

附录三：访谈完整记录(第四章) / 143

附录四：访谈完整记录(第五章) / 160

致谢 / 171

第一章 | 布迪厄“实践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一、问题的提出

当西方理论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中国,国内学者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似乎成了某种时尚。然而,这些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却面临越来越多困境,主要表现为西方理论与我国国情并不完全吻合,历史、文化、信仰、社会制度都不一样。西方理论应用于我国并没有体现出它们应有的关照,很多西方理论只能处理一般性的概念和规则,而不能处理具体问题,以致许多西方理论最终被“悬置”^①。国内学者大多集中在四个方面来讨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 (1)进行理论性解读^②; (2)在教育领域检验并考察“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文化再生产的理论逻辑^③; (3)运用布迪厄的“资本”概念考察我国的社会阶层问题; (4)研究与阶层相关的“习性”(habitus)问题。本研究把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放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框架内,即把“习性”和“资本”概念放在“场域”里讨论。本研究提出的框架性问题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群体是否具有解释力?这种解释是否有偏差?如果有,是哪些偏差?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偏差?

我国学者在借用西方理论时可能会忽视这些理论的语境。任何理论都是源于它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西方社会学理论往往是为了解释西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有些社会学理论,经历了西方社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社会实践验证,已经被西方学界普遍认定为“公理”。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都在各自的社会里,试图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来验证、巩固和发展这

① 冯钢. 社会学理论在中国面临的困境[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4-20(11).

② 朱国华. 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5): 173-189.

③ 董泽芳, 赵玉莲. 从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看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公平[J]. 现代大学教育, 2015(6): 1-6; 李春玲. 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 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J]. 社会学研究, 2014(2): 65-89.

些理论,同时不断应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理论发源地之外的社会文化现象^①。证明及应用公理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界的标准化程序。但事实上,当东方学者试图模仿西方学者,用公认的西方理论来分析在东方所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并努力论证这些理论在东方的适用性时,这些理论却往往被套用得有些牵强,因为我们总能发现普遍规律之外的特殊性^②。比如,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学鼻祖韦伯,曾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做过精准的分析,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分析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和多元的挑战,尤其是面对非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时,这些所谓的公理或许有失精准。这里不仅有国家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也有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世界时刻都在变,人们的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着,这些变化都需要新的社会学理论来解释和应对。因此,源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理论应该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发展和完善。

二、布迪厄“实践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偏差

近20年来,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已经被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广泛接纳,并用于解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和不平等现象。我在消化和应用该理论的同时,特别关注此理论在我国应用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我尤其想探讨布迪厄的“场域、习性、资本”概念在解释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时是否适用,是否会出现偏差。本研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场域、习性、资本概念在我国本土的应用过程是怎样的?是否能解释群体行为的差异问题?

(一)“场域”概念的定义和阐释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习性、资本。“场域”,就是一个社会空间,一个人人都有权利自由进出的开放性社会空间。它有实体,有职责范围、规章制度和法定的使命^③。社会就是由各种“场域”组成的,比如:文学场、艺术场、学术场、商业场、权力场等等。每一个“场域”都相对独立,并拥有各自特定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形式。这些权力关系和利益形式其实就是人们对游戏中争夺目标的价格

① 林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J].社会学视野,2007(5):20.

② 郑杭生,童潇.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之路[J].甘肃社会科学,2009(5):1-11.

③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Oxford: Polity Press, 1990: 52-65; BOURDIEU P, WACQUANT L.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57-229; 江小平.布迪厄传授“正在形成的知识”[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0-18[2011-10-21]. http://www.soliology2010.cass.cn/xszy/skzy/ybzy/2011/0/t2011/1026_1986672.shtml.

值认可。换句话说,每个“场域”内部都有一个游戏规则,每个人在游戏里的位置高低或重要性,由其对游戏规则的认可程度、技巧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对游戏的运作能力来决定^①。那么,“场域”内部争夺各种权力关系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焦点在于争夺“场域”内最终合法定义游戏规则的权利,争夺决定游戏的最终规范化权力,争夺决定游戏的赢家和输家的权力。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中曾这样解释:

对于参与游戏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特定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因为每个人在游戏中占据的位置不同(支配与被支配、正统与异端),以及获得这一位置的轨迹也各不相同,所以对他们来说,利益也同样千差万别的。人类学和比较历史学告诉我们,制度的社会巫术(social magic)只要得当,就能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建构成为一种利益,而且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利益,也就是说,将它建构成一种投入,在客观上可以由各种特定的“经济”给予回报……^②

“场域”能够激发人们在其中运作的利益。利益是“场域”得以运作的先决条件。“场域”必须能够创造意义和信仰,创造人们对运作活动本身的价值信仰。一个职业,就代表一个“场域”,比如作家、律师、医生、教师。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必须努力通过各自“场域”所规定的考核来实现资格合法化。任何“场域”内部都有职位高低和复杂的权力关系,往往是拥有最多资本的人,才能在权力之争中获胜。获胜者有权制定游戏规则。最关键的是,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制定、修改游戏规则。朱国华在解读布迪厄的场域内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时,曾提到:

法律、医学以及神学学科由于与政治场域具有特权关系,所以在大学里面具有特殊权威。这是因为这些学科执行着社会权威再生产的代理人功能:法律管理着社会实体的司法系统,医学管理着社会机体的健康,神学则是社会道德美好生活的保证。这些学科学生的后代往往沿袭其父母,但是应用学科或教育学科则不然。前述学科也容易使得学生更容易进入其他有权力的场域。克林顿、布莱尔即为例证。其他一些西方高等

^①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59;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11-115.

^②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59.

教育的情况中,商业与信息技术学科具有此种地位,因为它们具有金融管理与技术色彩。别的学科不具有通向社会权威的道路,必须要寻找其他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要求。它们如哲学或自然科学,宣称自己探求的是更高的真理和纯粹知识,独立于社会世界、政治价值之外。^①

也就是说,学术“场域”内的各个学科,孰重孰轻,要看这个学科是否能再生产出权威执行者或使学生能进入有权力的“场域”。权力场深度渗透教育场,影响着教育自主性。

(二)“习性”概念的定义和阐释

现在,我们来看“习性”^②。布迪厄的“习性”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它具体是指个人或群体的言行及总体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它来自个体或群体所身处的特定“场域”,是人们在多年遵守该“场域”游戏规则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③。这种行为倾向,是根据某个“场域”内的游戏规则不断做出相应调整的。布迪厄认为,由于“习性”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着经验的变化而改变,并且在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和调整自己的结构。“习性”相对稳定持久,但并非永恒不变。比如,一个人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的“习性”有与农村环境相适应的特点。但是,进入城市之后,其“习性”可能会随着新“场域”和经验的变化而被迫做出调整,尤其是当在城市生活的时间远远长于在农村时,其“习性”可能会慢慢具有城市环境的特点。布迪厄把“习性”看作是一种发条,需要拨动它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说,即使是完全相同的“习性”,在受到不同“场域”的刺激后,有可能会产生不同于从前的、与新“场域”相匹配的“习性”(详见第五章)。毕竟,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这包括整个社会大“场域”结构下生成的历史,也包括特定的小“场域”内个体和集体生活道路上积累经验的历史。如此看来,“习性”既有历史的持久性和延伸性,也有随机突发的可变性,一切皆取决于

^① 朱国华.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厄教育社会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5):173-189.

^② 也有人把它译为“惯习”。为了避免跟“习惯”混淆,我倾向于把它译为“习性”。

^③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M]//HALSEY A H, BROWN P & WELLS A 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41-258;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Oxford: Polity Press, 1990: 52-65; BOURDIEU P, WACQUANT L.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57-229.

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方式和过程。

(三)“资本”概念的定义和阐释

布迪厄在“实践理论”中谈到了“资本”概念,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这是“资本”的三种形态,总称为“符号资本”。其中,“经济资本”是指个体的金钱和物质的累积,这个资本可以是家族继承的,也可以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的。“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总积累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阶层以及与此阶层相关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它比其他资本更容易管理和计算。“文化资本”是指人的文化实践,包括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获得的各种学历学位,以及自身的各种文学艺术修养、生活情趣和品位等等。“社会资本”是指个体的社会网络、可以利用的人脉资源,它与人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三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特别是“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本的总和将决定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道:

那些经济资本富有的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社会再生产,不得不大规模地增加对教育系统的投资和利用。当时一部分很少利用教育系统的阶级成员,也参加了追求学术资格的竞争,其结果是更加强了那些主要通过教育系统来建立资本,从而实现再生产的群体,这些群体通过教育而保持了相对稀缺的学术资格和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①

社会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单独基于经济或文化概念的研究完全不足以解释社会过程,应该把文化和经济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合二为一。在过去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有大量文章和著作致力于此类文化经济研究^②。布迪厄也做了大量有

^① 布尔迪厄,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 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74.

^② MCROBBIE A. A Mixed Economy of Fashion(Chapter 1) [M]//AMIN A, THRIFT N. The Blackwell Cultural Economy Read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3-14; APPADURAI A.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J]. Public Culture, 1990, 2(1): 1-24; MOTE J E, CALLON M. The Laws of the Markets[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00, 29(5): 729; DIXON J.A. Cultural Economy Model for Studying Food Systems[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999 (16): 151-160; DU GAY P, PRYKE M. Cultural Economy: Cultural Analysis and Commercial Lif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s Ltd, 2002: 1-38; GIBSON C, KONG L. Cultural Economy: A Critical Review[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 541-561; HINDE S, DIXON J.Changing the “Obesogenic Environment”: Insights from a Cultural Economy of Car-Reliance [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05, 10: 31-53;(下转第 6 页)

关文化和经济概念相关联的研究,比如,他认为人们的消费性情和品位就直接与经济水平和能力相关,而这一点往往被单纯研究经济因素的学者们所忽略。中产阶级作为整体,他们的“经济资本”的积累是相似的,相似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能够享受相似“文化资本”;同时,这个阶层的圈内人由于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资源而走到一起,他们频繁交往,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社会资本”。这三个资本实际上都与社会阶层有关联,而“经济资本”是三个资本中最有效的形式,它可以通过金钱的形式,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布迪厄曾经写道:

社会出身完全确定了不同的机会,从生活条件到工作条件。作为诸多决定因素之一,其影响是唯一能够扩展到学生经验的所有领域和所有层面的决定因素,其中首当其冲的乃是生存条件。居所以及与之相关的日常生活方式,经济来源以及不同花销的分配,随着经济来源而发生变化的依赖感的强度及模式(获得这种经济支持,由此所导致的经验与价值的性质其实也一样),所有这些,都直接而且强烈地取决于社会出身,与此同时还会传输社会出身的影响。^①

(四)“场域”“习性”“资本”概念之间的关系

布迪厄的“场域”“习性”“资本”三个概念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布迪厄把“场域”和“习性”之间的关联看作是两种相互作用的方式:一方面,两者之间有制约关系,“场域”形塑“习性”,“习性”又是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两者之间是一种知识关系,“习性”有助于把“场域”构建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②。比如,大学里的“习性”是科研加教学,这是大学“场域”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每个教师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每个教师都想把这个游戏玩好,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如奖金、荣誉、绩效工资和职称等等)。教学科研能力强的教师,在大学“场域”里会受到奖励,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会提高,学术话语权

(上接第5页)LASH S.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M]// CALHOUN C, LIPUMA E and POSTONE M.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3: 193-211;RAY L, SAYER A.Culture and Economy after the Cultural Turn[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1999: 135-161; SCOTT AJ.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M].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 1-20.

① 布尔迪厄,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4.

②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57-185.

也自然提升。只要“场域”内的行动者都认同这样一个游戏规则,即便自己输了也是服气的,因为大家都在努力按规则行动。这就是“场域”和“习性”之间的关系。

那么如何关联地去看待“习性”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呢?在谈到“场域”和“习性”的关系时,布迪厄经常会提到“游戏感”。游戏感就是通过计算“场域”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对自身“习性”做出可预见的调整的能力。人们在某个“场域”里的行为是否投入,首先取决于他们对游戏的认可度。在理解“习性”与“资本”的关系时,我们认为“习性”的基础是“资本”,它本身自带“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资本”的积累使“习性”成为可能。比如,有人在学术“场域”里如鱼得水,适应得非常好,这是因为他们有更多与该“场域”类似的文化经验和背景,有更多相关的文化积累。这些“资本”积累较雄厚的人也一定比其他人更热衷投入学术竞赛,而且这种突出的学术热情往往能使他们在学术竞争中胜出。相反,如果“场域”内的行动者的各类“资本”积累均有限,总觉得自己入错了行,进错了门,加上他们对游戏规则的认可度不高,对所在的“场域”缺乏认同感,结果很可能会截然不同。

三、对“场域”“习性”“资本”概念的质疑

(一)“场域”概念的问题

我对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存有疑惑。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一个相对稳定、有边界、有利益和权力关系之争的客观空间。他坚持“场域”的结构性和客观性:

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所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①

但是在我看来,“场域”空间的界限比较模糊,比如,权力场、艺术场、学术场等都是不可触摸、非实体的概念空间,需要靠人们的主观意识和想象赋予它们意义,甚至可以说“场域”是暂时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主观构建的。

^①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3-134.